

青白江文史

第七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成都市青白江区委员会

编

一九九一年
六月二十日

目 录

一 李世洪与“青年会”.....	1
黄俊宽 张隆焕供稿 林左整理	
二 不断奋进 为西南地区氮肥示范的成都化肥厂.....	9
陈明生写稿	
三 川化厂址三勘纪实.....	30
严志亮写稿	
四 解放前在城厢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党团员.....	38
张成毅写稿	
五 补记彭家元.....	44
余伯奎写稿	
六 余静涵.....	52
余伯奎写稿	
七 解放前的中医师公会.....	56
陈问渠写稿	
八 对弥牟镇“八阵图”的几点粗见.....	59
魏拓夫写稿	
九 明教寺.....	62
曾佑君写稿	
本期责任编辑 廖跃斌	
编 辑 余伯奎 林 左	

李世洪与“青年会”

黄俊宽、张隆焕供稿 林左整理

人和乡地处龙泉山西脊，毘连金堂、简阳和龙泉驿，素来偏僻。贫穷。40年代初期，这里的反动统治者——乡保长，依仗“山高皇帝远”，大发“国难”财，估拉壮丁，强派各种苛捐杂税，农民在水深火热中苦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时有个叫李世洪的人，代表贫苦农民，发起和组织“青年会”，向压迫他们的反动统治者进行多次反抗斗争，威震龙泉山一带。至今为人称道。据我几十年耳闻目睹的一些往事，追述如后：

李世洪其人

李世洪，人和乡十保（即今卫星村）人，40年代初期那阵，30多岁，中等身材，身躯瘦壮，粗识字，精通石、木、土工匠手艺，为人正直，好打不平，乐于助人，深受贫苦农民的拥戴。年轻时，一次打过路抢劫的土匪，额部被子弹击伤而起个包，长久不消散，好多人又称他“包包大爷”。1943年，乡保长数派壮丁款，又估拉45岁以下的贫苦农民当壮丁，整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李世洪在这一带开山打石、修房造屋的活动中，深知民间痛苦。有个近邻何方兴，是帮办红白喜事的厨师，亦深知民情人心，与李世洪由同感而同心，结成知己朋友，萌发要把同心者捆成一把的念头。“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起来力量大”，才能对付欺压老百姓的坏公事人。

“青年会”成立

1944年春天，经过李世洪、何方兴的串联发动，在抗丁、抗捐的口号下，团结了二百多人，在白庙子（今卫星村境）开会。因为与会者青年人居多，七嘴八舌，决定取名“青年会”，为当时首先受拉丁、摊捐之苦的青年人撑腰壮胆。开会也没有正规的议程和规章，但统一了两个问题：一是推举李世洪为首领，何方兴、李世发为副首领（当时并无明确的称谓，反正拥戴三人为正副头领就是），二是明确组织“青年会”的宗旨，是“惩办贪官污吏抗拒拉壮丁，抗拒苛捐杂税。”

为受害弟兄打不平

“青年会”成立时，正是估拉壮丁的极盛期。李世洪本保有个老实巴巴的贫苦青年农民陈培云，被心肠歹毒的保长严鑫打“窝下食”，估拉陈的壮丁，陈拼命躲逃，严一路追赶，逼得陈躲进一家泥楼，严带起团丁跟了进去，搜寻不着，放乱枪吓人出来。陈乘其不备，又逃往邻近的一家院房，为严发觉，又穷追不舍，眼看就被追着。陈顺路跳进蔡家的一个粪坑，手里提着有麻耳的旧草鞋，团丁误以为是手榴弹（当时手榴弹有麻柄的，不全是木柄），不敢冲进陈培云身旁，又怕事情酿大，只好作罢。接着，本保农民李永富赶场，又被人和乡乡长郑元江的狗腿子拉了壮丁。两件事的受害者都是李世洪的本保人。李世洪把这个问题提交“青年会”商议，决定立即进行说理斗争。于是以“青年会”名义，约请严保长到白庙子议事谈判。严仗着有狗

腿子、枪杆子，耀武扬威地到了白庙子。“青年会”早作严密部署，以审被告的形式，打严保长的下马威。严鑫一到，即被“青年会”的人挟持于中，李世洪以审判官的架势，数落严估拉陈培云壮丁的罪过，严无理词穷，一付“阶下囚”模样。“青年会”的人骂严做事没屁儿，拿起青杠棒尖，要锤严的屁股，严吓得下跪求饶，一再保证不敢做伤害农民弟兄的事。严保长虽未受皮肉之苦，但从此威风扫地，露骨做坏事也有所收敛了。此后，李世洪从哥老会等渠道，找乡长郑元江对话，提出放回李永富，就息事宁人。否则，“青年会”要对郑不客气。郑元江慑于“青年会”的势力，又自知理亏，只好放了李永富。这两个个别问题虽然斗羸了，但整个估拉壮丁，强派苛捐杂税，还是有增无减。

改称“乡村文化协会”

过了一年之后，已是1945年夏天。经过“青年会”同仁“滚雪球”式的串联发动，“青年会”已从人和乡，发展到毗邻的金堂县同兴、白果、五凤等乡，简阳县（含今龙泉驿区）万兴、洛带、文安、西平等乡，以及华阳县的石板滩等场镇，有好几千贫苦农民加入“青年会”。这时，上边来了一个叫陈立三的人（自称是记者，据说是地下党派来联络农民义军的），了解到李世洪和“青年会”的目的、宗旨，和加入对象的情况，决定支持李世洪的活动，李世洪也相信陈立三讲的形势、任务和斗争方法。经过商定，为扩大影响，壮大队伍，鼓舞士气，改称“乡村文化协会”，于夏末的六月，在石城寺搞一次

“乡村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四千多人。相当部份已带有枪弹。在石城寺庆贺了三个昼夜。会上选出李世洪为主席，何方兴为副主席，以下以乡建制，听从李世洪指导。协会明确宣布，会员以贫苦农民和手工艺人为主体，拥护、支持本会的其他人士酌情吸收一些，绝对不准豪绅、袍哥、土匪混进来。会上有个叫刘代富的土匪，当场被宣布除名。

斗垮反动乡长 郑元江

石城寺大会那阵，拉丁派款，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祸根就是反动乡长郑元江。而郑元江做“掉脚庄稼”，任人和，执掌生死予夺，而本人却长住寥家场，与寥家场的封建把头和国民党的驻军结成一帮，沽名欺世。贫苦农民要出气，要生存，“青年会”决定从郑元江开刀。经过一番筹划，利用郑元江返人和乡的机会，重重惩罚一次郑元江。安排一个岗哨在白果树（今陈家湾火车站河对面）山梁上，观察郑元江返人和的两条路线：一是寥家场——三元桥——青林寺——红棺材（人和乡街道后的山峰名），回乡公所；另一条是寥家场——祠子坡——懒人坳——李家石梯子，回青林老家。如从第一条路线，哨兵鸣一枪；从第二条路线，哨兵则鸣两枪。按此信号，堵截郑元江，杀他的下马威。时值岗哨打瞌睡，郑元江溜过红棺材，岗哨醒来才发觉，忙着鸣枪一响，伏堵的“青年会”的执枪人员闻声赶来，向郑开枪射击。郑元江跳下滑竿，在狗腿子的掩护下，利用山脊岭埂，躲过射向的子弹，沿山梁逃进保长李成祯的大院，利用碉楼，抗拒“青年

会”的追击。相峙一阵以后，“青年会”人员撤离，郑元江虚惊一场。郑元江知道“青年会”势大，法不责众，于是变换手法予以“安抚”，派其亲家刘元太（现平桥村人），找到李世洪，在许家堰（今平桥村），提出以息事宁人为重，进行谈判。“青年会”当仁不让，明确提出三条。一要郑元江下台，二要民主选举乡长，三要保障“青年会”人员的人身安全，不得佑拉壮丁。刘元太自然不敢应诺，推说回去商量。请大家放心，包大家没事。郑元江得知后，对李世洪恨之入骨，于是向县长袁祉光稟报，说李世洪聚众造反，抗丁抗捐，请派兵弹压。袁祉光也是狡猾之辈，来了一个不知可否的表态：区区山民，何劳兴师动众。乡丁出马，自可平息。郑元江自知势单力弱，对付不了“青年会”，于是在1945年就贿通廖家场驻军——国民党18师一团二营营长彭世经，手下连长郑少邦自告奋勇，带起全副武装的一连人马，于1945年4月初，以“剿匪平乱”为名，兵分两路，从白庙子和刘家沟两线合剿石牛（李世洪住家的后山）。当敌军以轻重机枪横扫一陈之后，才知李屋无人。然后两路人马翻上阎王坡汇合起来时，“青年会”的伏兵，从大坟包梁子上，从观音庙梁子上，从界牌梁子上，从官山梁子和断龙井等处，四面八方向敌军射出仇恨的子弹，加上“土台炮”（大口径铁筒，装上铁屑、火药）的杀伤力，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丢了一挺机枪，夹起尾巴败回廖家场。

一波未平，二波又起。郑元江贼心不死，过几天，又以重利打通彭世经营长，电请师部，命令驻中江县杨任团长，带起一个炮连驰来

人和，两军对阵，“青年会”人多，火力又猛，敌军便使出迫击炮。“青年会”为避免伤亡，向石城寺后撤，以诱敌深入，再围而歼之。敌军紧追一公里多，至土地庙山顶。“青年会”把土台炮集中了几门，瞄准敌军开炮，有晒席宽的铁屑弹片，还有哑子弹（报废的步枪弹）在头顶开花。敌军乱着一团骂娘，说“老子什么炮都见过，就未见过这种拦天炮。”在这场鏖战中，“青年会”万兴乡头领郭万田战死。为避免更大伤亡，“青年会”人马最后撤至石城寺，这是“青年会”的第三道防线。敌军以为“胜利”进军。当他们进入包围圈后，迎接他们是更多的火力和怒吼的多门“土台炮”，敌军在悬崖上组成一个三挺机枪的火力点，被怒火满腔的几个“青年会”成员，接连从上掀起巨石，把三挺机枪砸烂，机枪手只好躲进凹形山坡，保住了性命。这天下午四点过，敌军自知天黑后日子更难过，于是重整一下队伍，冲开一条铁道，狼狈不堪地败回廖家场。

事后，国民党驻军责备郑元江谎报军情，惊动正规军，耗费枪支弹药，索赔了大洋两千元。县长袁社光派人找“青年会”谈判答应撤掉郑元江的乡长职务。

除 暴 安 民

斗垮郑元江之后，“青年会”（因乡村文化协会不顺口，仍称“青年会”）已成为地跨金、筒、华山区，拥有数千人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农民武装队伍了。从自发地抗丁抗捐，转变为除暴安民。矛

头所向。首先就是压榨百姓，称霸一方的“乡王”。

当时，简阳县万兴乡乡长朱春华，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成了贫苦农民的死对头。“青年会”决定先向朱开刀，以警效尤。1946年6月，利用万兴乡在大林盘选保长之机，乡长朱春华责无旁贷地该到场指导。会场设在古刹“玉皇庙”庙里。持枪的“青年会”人员，事先埋伏在会场附近的山林、山坡上。当朱春华进古庙时，有人放了两枪，惊吓了朱。朱龟缩于庙中，选民自然选不成保长。朱在其保镖的掩护下，穿玉米林逃窜。其头部为飞弹击伤，虽然杀朱不成，回到了万兴乡公所。但其上峰为平民怨，朱春华还是从乡长宝座滚下台来。

1946年7月，“乡村文化协会”决定在西平乡香炉山开大会，陈立三为开会安全起见，决定一行3人去找西平乡乡长刘朝章交涉。

“协会”首领劝阻陈立三不要冒这个险。陈执意要亲自出马。果然，在陈到刘朝章家面谈中，刘抢先开枪，当场杀死陈立三，随行二人也被刘的保镖杀害。噩耗传来，激起“青年会”（由于协会名称不顺口，大家还是称“青年会”）的成员义愤填膺，提出诛灭刘朝章，捣毁乡公所，为陈立三报仇。

经过一番筹划，决定七月廿九日集队进驻瓶子场（今洛带镇）。首先控制镇后的燃灯寺和黑风寺两个制高点。义军浩浩荡荡几千人，各自带上干粮，背背长枪在镇上连驻四天。由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连瓶子场的区长刘会安（人称刘团总）也称道这支队伍“少见”，欢迎义军借道过境（目标是西平乡，对头是刘朝章），还下令镇上的饮

食、茶水。糖果业昼夜营业，为“青年会”提供方便。这时刘朝章闻讯如惊弓之鸟，早已逃到桃花寺他本家刘光辉家。“青年会”队伍向桃花寺进发，在桃花寺交上了火。刘朝章寡不敌众，带起保镖逃走。“青年会”再向刘朝章老家挺进，不一会攻下刘家大院，才知是空屋一座。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刘朝章的巢穴。而另一支人马，同时砸毁了西平乡乡公所。也算初解“青年会”队伍的心头之恨。刘朝章虽然在石板滩躲过了此劫，可是其上峰为安抚民心，还是把刘从乡长宝座赶下台去了。

尾 声

一斗郑元江，二整朱春华，三打刘朝章，“青年会”军威大振。据说，以“青年会”主席李世洪署名的布告，内容主要是警告乡保长不准拉壮丁，不准乱派苛捐杂税，不准贪污肥己，保障人民安全等。贴到了廖家场和县城城厢镇。还有人说，这个告示还贴进了省会成都。

由于陈立三遇害，“青年会”缺乏革命理论引导，李世洪等人又回到抗丁、抗捐的自发性斗争上去，作为就不大了。李世洪在建国后，仍从事石木手艺，为人造福。1980年病故，享年76岁。

40多年过去了，一些老“青年会”成员在回首往事时不无感叹地说：“青年会 那阵，陈立三为不遭杀害，李世洪有革命导师指点，我们肯定会在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中国的斗争中做出一些贡献的”。

不断奋进。为西南地。县氮肥厂示范的

成都化肥厂

陈明生写稿

(一) 成都化肥厂在青白江区诞生的历史背景

成都化肥厂，1958年初建时，名为四川省小型氮肥示范厂。1962年更名为温江地区氮肥厂，至1983年，原温江地区与成都市合并后，始改用现名。

成都化肥厂，是顺应历史的发展而诞生在青白江区的。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结束之际，毛主席即深谋远虑的提出：为加速发展农业，相应地要加速发展化肥工业，化肥工业只靠建几个大型骨干化肥企业远远不能适应广大农业发展的需要的。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便提出：“化肥厂统一由专区办”的指示。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于1958年1月又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化肥厂的设备”。

在这以后不久，我国在世界化学工业享有盛誉的著名化学工业专家、原化工部付部长侯德榜博士和化工部总工程师谢为杰等，即新推出了一套年产2000吨合成氨，8000吨碳酸氢胺的设计图纸。为加速发展我国的化肥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其特点是，在技术上

采用创新的“碳化法”，取代传统的一般净化法，以加温加压而合成氨。这不但顺利的得到液氨，而且同时也得到碳酸氢胺新品种化肥，不再须用其它物质原料与氨作用，方可产出化肥的途径。因而工艺流程比传统工艺简化、设备减少。金属材料也多属碳钢，国内即可生产，设备也可自制。钢材和其它材料，用量均较省。投资小而见效快。从而为发展地方中、小型化肥厂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条件。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简称成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为了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也要建设化肥厂增产化肥，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化肥厂、南宁会议上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来，每县都可以办”。于是这次会议决定在全国首批兴建13个县级氮肥厂，作为全国的首批布点和示范，待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星罗棋布，遍地开花”。这十三套布点厂的分布是：“全国六大行政区各1套，华东6省、市（上海）各1套，北京直属市1套，其配套设备，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答应承担，由上海市为全国统一配套供应。

西南区所分得的一套，由政治局委员、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安排。李鉴于温江专区乃天府之国的大半个粮仓，兼有四川肥料厂（即今之四川省化工总厂）的技术支援作后盾，便决定分给了温江专区。温江地委当即决定交由金堂县委负责组织筹建。但有关建厂的重大问题，均由地委工业书记官韫书同志亲自过问与布置解决。

1958年4月末，地委官书记亲自到金堂与县委商筹决定组织筹建班子，由金堂县委工业书记路恕远同志兼任筹建委员会主任，官并指调陈明生同志到厂任筹建主任，作为担任厂长的实际行政负责人。因此，于1958年5月3日，我便带着金堂县委先后分配给的二十名建厂干部到了华严工地，在四川肥料厂厂长牟海秀同志的支持下，由川化在“983”工地借给了两间办公室，开始铺开了筹建工作。这时，青白江工区，除在建的川化厂以外，这个厂还是第二家在此始建的国营工厂。

我被调来青白江筹建该厂，以至将在此终了一生，也许是历史与命运安排的巧合，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开始时，在县里抽调“大学生归队”，当时不仅学理工科的抽调到工业战线，学其它专业的，也抽调了不少的到文教、政、法、经济战线，而我这个学政治经济专业的，可能由于在政府办公室工作，已属从事了本行而未被抽调。嗣后于1955年春，又由于在办公室工作的关系，开始与工业有了接触，当时四川省曾规划计划在大同、华严境内建一个成都的卫星城——金堂市，市区规划包括城厢、祥福、大同、华严、弥牟（当时还属新都）。远景规划此金堂市的城市人口达30万，当时计划在此建设的有机械、纺织、轻工、化工等部，省属大型企业7个，后来只来了川化在此建设。当年的春夏之交，省委派出有关计划经济、工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与专家等十余人前来此地察看。由于规划地段，属金堂县辖境之内，我由于工作关系，便被派作为金堂县政府

的代表来此参加了那次察勘，自此与青白江的工业建设沾上了边。以后筹建组金堂市的负责人赵玉书同志来金堂开展工作，并参加了金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由于我的工作关系，与工区的建设事宜（如征地等）接触也就有所增多。这次省、地决定交由金堂负责筹建西南区第一个小氮肥示范厂时，碰巧选点在此兴建，而且又特别强调企业领导及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文化结构，要求厂长要大学生，操作工都要初、高中生，于是我这个并不学理工的，也许又由在政府办公室工作的关系，于 56~57 年被县委指派负责全县的征购任务的分配与催交中，与时任温江专署专员的官韫书同志接触较多。这时，他任地区工业书记，便指名要我来担任此筹建任务，自此，我便与青白江这个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岂非是历史与命运安排的巧合。对此，我曾写了一首感慨诗：清江建设工业城，我到清江度一生。昔日农田成闹市，长街十里庆繁荣。

（二）该厂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首批布点的十三套县级氮肥企业，虽在规模较小（年产合成氨 2000 吨），但在工艺技术和设备、自控作，都是大型企业的缩小，都属现代化，加之又肩负为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北京、上海）示范的使命，故其任务重、意义深、责任大，就远非一般企业可比。因此上至中央化工部、下至省、地、县都极为重视。中央化工部对上海配套的全套设备，一直抓得很紧，将十三个厂派驻上海催交设备的同志，组成“化工部 13 套驻沪工作组”专门负责与上海有关方面联络催交

事宜，并及时向化工部汇报情况。我也曾作为驻沪工作组代表之一，驻沪9个月，往返于京沪之间。各厂建设中的重要钢材如板材等，都得到化工部的支持专拨直供。在十三个厂的领导关系上，有约半数的企业，为各省工业厅的直属厂，如广东、江西、湖北、安徽等省，其它虽由地、县属的，也都作为省的重点建设工程筹建，受到省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我厂作为西南区的试点厂，虽由省、地交由金堂县负责筹建，但在建设中有关人、财、物的较大问题都由温江地委的官韫书书记直接指令布置安排。四川省重工业厅（当时四川省只有一个工业厅），也极为重视，在筹建开始时，即派出基建处处长李逸同志带领工程师谢大经、贺东昌等到厂帮助安排组建有关筹建的组织管理机构，并将谢大经工程师留厂帮助达一年之久。四川肥料厂（今川化总厂）厂长牟海秀同志，也受省委、地委委托，派出季膺夫（即现任我厂的付厂长总工程师）及有关设计、计划、供应、设备等方面六七人，负责指导与协助工厂的筹建。而且在建设中有关工程进展的简报，均寄送牟海秀同志本人。牟厂长均仔细阅与批示，凡应由川化帮助解决的问题，均交由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建厂初期的厂名“四川省小型氮肥示范厂”，也是地委官韫书记委托牟海秀帮取后，又征得四川省重工业厅寇厅长的赞同而命名的。

始建时，为使示范厂能够办好，对调厂人员的素质，省工业厅与温江地委均十分重视。省工业厅特从乐山地区抽调两名熟悉机械技术

的老工人前来支援。温江地区则由书记指令当时所辖的十七个县，每县从在职干部中选派 10 名（金堂筹建县派 20 名）共 190 名，到厂参加筹建工作。并指示这些同志到厂后要先当工人，学习技术，再学管理。作为尔后返回各县建厂的骨干，因此便先后被派往上海化工研究院实验厂和四川化肥学校与四川化工厂等处培训学习。1958 年 6 月中旬，温江地委又从转业军官中抽调 2 名团职干部（即白玉山、付晋榕）到厂充实领导班子，加强党委的工作。

示范厂的历史使命：从建厂一开始，省、地领导就每次明确指出，示范厂要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就必须做到四出：“即出产品、出经验、出技术、出人才”。所谓出产品就是要使国内首创设计的新型化肥品种——碳酸氢镁真正过关，在产量、质量上完全达到设计要求和国家规定的指标，成为既有工厂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优质产品；出经验就是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科学管理的经验，使之能成为各地新建厂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出技术，就是要使我国首创自行设计的新工艺技术摸索过关，臻于成熟以便为尔后新建厂有所遵循的操作技术规程；出人才，就是要求培养出一大批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的职工队伍，以为省内外培训和输送配备一批德才兼备的生产、管理和技术骨干。从而可见这个厂的历史使命，从一开始，就是十分艰巨而繁重的。

（三）成都化肥厂在完成历史使命中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与所取得的成就

为胜利完成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这个厂从一开始便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争取工厂早日建成，以使首先布点的这个新星，闪烁在西南大地。中央化工部在13套设备落实在上海配套后，对各大区和各省市的布点厂排了一个先后供应的名次，西南的一套(即我厂的)排在第五位。但化工部明确向各在建厂指出，“设备供应名次，仅是初步的安排，以后将根据各厂建设的进度与条件再重作调整”。因此建设的速度与条件，便成为该厂能否早日建成的关键。故而这个厂自1958年5月初筹建工作一铺开，便首先选择厂址于四川化工厂的西南角铁路专用线之北100米处(即现成钢厂址处)抓紧破土动工兴建。仅以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厂址的地质钻探；场地平整；接通了水、电；与工区干道连接的3公里的公路，也由金堂县抽调邻近的龙王、日新两乡的数百民工前来突击完成；并修好了简易的设备，材料库房与办公用房等。已临主厂房正式动工的前夕，这时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求全党把注意的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上来，提出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此时，成都市委决定办一个钢铁厂(即现今之成都钢铁厂)，前来青白江选择厂址时，恰好选在这个厂已经开始施工的厂址处。因该地距铁路专用线近，便于矿石的原料与钢铁的运输。于是经成都市委与温江地委几经商得同意，决定这个厂服从大局，为“钢铁元帅”让路，另行选择厂址于四